

清代锡伯族西迁的历史贡献与当代价值

付云逸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DOI

摘要: 本文详细回顾了清代锡伯族西迁的历史, 突出强调了锡伯族在边疆安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锡伯族的西迁不仅是历史事件, 更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他们的故事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同时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关于民族团结、文化交流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宝贵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 锡伯族西迁; 民族团结; 爱国主义精神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Westward Migration of the Xibe Peopl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Yunyi Fu

College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detailed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westward migration of the Xibe peopl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emphasizing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of the Xibe in border secur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advancement. The westward migration of the Xibe was not only a historical event but also a manifestation of patriotic spirit. Their story demonstrates the united and self-reliant national spirit formed by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out history and also offers valuable experiences and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terms of ethnic unity, cultural exchange, and national security.

Key words: Xibe westward migration; ethnic unity; patriotic spirit

前言:

清代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为了巩固西北边防、加强对伊犁地区的管理, 清政府调遣盛京等地的锡伯族官兵及家眷共三千余人西迁新疆。这一跨越千里的民族迁徙, 不仅是清代移民戍边政策的重要实践, 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壮举。锡伯族官兵及其家眷历时一年有余, 克服了气候严寒、雪水阻路等重重艰险, 最终抵达伊犁。

长期以来, 锡伯族在新疆的驻防与屯垦, 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边疆开发以及推动多民族文化交融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不仅在驻守卡伦、平定张格尔叛乱、抵御沙俄侵略等政治军事斗争中表现出极高的爱国热忱, 更在兴修察布查尔大渠、推广农耕技术等经济建设中作出了卓越贡献。本文旨在通过梳理锡伯族西迁的历史过程, 深入分析其在政治安全、经济开发及文化创新方面的历史贡献, 并进一步探讨西迁精神在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价值。

一、锡伯族西迁对边疆安全的贡献

锡伯族西迁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 清政府从盛京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18人, 连同官兵的家眷共3275人。他们自盛京出发, 就近从彰武台边门而出, 沿克鲁伦路到乌里雅苏台, 到达已是八月下旬, 天气逐渐变冷, 于是在乌里雅苏台暂作歇息。到了第二年

(1765年), 随着天气逐渐暖和起来, 部队也完成了休整工作。在三月十日这一天, 部队再次踏上前往伊犁的征程。^[1]

当部队行进到科布多一带时, 恰好遇上阿尔泰山的积雪开始融化, 积雪融化后的雪水致使河水猛涨, 泛滥的河水把前行的道路完全阻断, 部队根本无法继续前进。于是, 部队只能在这个地方停留下来, 耐心地等待河水水位下降。可是, 日子一天天过去, 河水却连续好多天都没有退下去的趋势。面对这种情况, 部队果断决定绕行科齐斯山。^[2]在经历了漫长的跋涉, 他们沿着既定的路线, 途经额敏、巴尔鲁克、博尔塔拉等地, 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七月二十日抵达了伊犁绥定一带。

(一) 驻守卡伦, 换防台站, 维护边疆秩序

清代锡伯族西迁有着明确而重要的目的, 那就是为了解决边防方面的需求, 进而保卫国家内部的安定局面。锡伯营在当时承担着诸多重要职能, 其中首要的职能便是驻守卡伦以及换防台站。^[3]为完成驻守卡伦的任务, 锡伯族的官兵们需要精心操练骑射技艺, 这是他们履行职责的重要保障。他们要按照规定前往指定的地区进行驻扎, 并且展开定期的巡查工作。

18世纪中叶的时候, 清政府成功统一了天山南北地区。为了稳固边防, 清政府在边境精心设置了卡伦。这些卡伦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发挥着“内稽逃人, 外控荒服,

延边定界”^[4]的功能。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卡伦的设置有着清晰的权责界限。在游牧管理方面,它能够有效地管理各个部落的游牧范围,防止部落出现越界游牧的情况,这对于维持游牧秩序是至关重要的。对于重要的山场以及水陆交通要道,卡伦也发挥着管理职能,比如可以安置罪人,还能够缉获那些逃窜的犯人。而且,卡伦在维护边疆安全方面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仔细稽查那些来历不明的行旅,从而防止外敌的入侵,同时也能防范盗贼的出现,从多方面达到维护边疆社会稳定的目的。

除了驻守卡伦之外,换防台站也是锡伯营驻扎边疆的一项关键任务。锡伯族官兵主要前往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等地的台站换防,这些台站均为清政府极为重视的要地,所以要求每两年进行一次换防,每半年换回一半官兵,并且官兵需自带鸟枪军械,差役期满后带回。此外,除了驻守卡伦与换防台站,锡伯官兵还承担着巡边和巡狩的任务,以此确保边防安全。例如,每年夏季会派遣领队大臣巡巡布鲁特游牧界;每年秋季派遣领队大臣巡巡哈萨克游牧界;每年八月,伊犁将军、参赞大臣依照惯例前往喀什噶尔等地巡狩,这被称为将军放围。^[5]锡伯官兵听从圣令驻守边疆,履行守边职责,为保卫边疆安定,维护边疆秩序作出了贡献。

(二) 平定叛乱,守卫边疆安全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到道光八年(1828年)发生了历时八年的“张格尔叛乱”。官兵们驻守卡伦,严防张格尔与其旧部乱贼相互勾结。张格尔欲与追随他的贼匪一同前往阿尔图什回庄纠集叛众,却不料该处回众得知将军长龄与杨芳带军驻扎的消息后四处逃散。张格尔与追随他的贼匪马队仍贼心不死,又再次向阿尔图什出发,但遭到四百余名回众持械阻拦,无奈之下便又从原路折回。随后根据叶荣探得的情报,已知张格尔逃出卡伦后直奔喀尔铁盖方向去。于是长龄立刻下令各队官兵竭力追捕,不得有丝毫疏忽。杨芳连夜带兵前进,即刻赶到喀尔铁盖山内,发现了张格尔及其乱党的踪迹,于是兵分两路,与逆贼激战,当场击毙贼匪两百多人。张格尔在前,率领马匪三百余人占据半山,欲突围拼杀。但在前后夹击的态势下,张格尔及其匪贼无力抗衡,便向山沟逃窜,在此过程中三百余名匪众也被抓获,当场击毙,只剩下马贼三十余名爬山逃窜。

胡超、伊萨克等听闻已擒获贼目依斯拉木素皮察克,便趁破竹之势力追剩余贼匪。山高路滑,众贼无奈弃马爬山。胡超带领众官兵、民众,也弃马追踪,接着又击毙贼匪五名,其余匪贼四处逃窜。最后,张逆及其乱党仅剩十余名,掷石回击企图反抗。

巴图鲁都司段永福、额尔古伦、胡超各带领一队官兵极力逼近。在此情境下,张格尔欲拔刀自刎,被夺刀活捉,又擒获余贼八名,其余贼匪也被剿杀。随后将此消息上报

清政府,获得高度称赞,并感“实深嘉悦”,下令将张格尔押至京师,听从处置。又对长龄、杨芳、杨遇春、武隆阿、胡超、额尔古伦、都司段永福、马甲讷松阿、舒兴阿、兵丁杨发、田大武等加以赏赐。赏赐锡伯营总管额尔古伦副都统衔、头品顶戴,赐“国尔明阿巴图鲁”号;马甲讷松阿著赏给“侃勇巴图鲁”名号;舒兴阿著赏给“绍勇巴图鲁”名号,以上均照例赏戴花翎,与额尔古伦同列紫光阁,以表示忠勇。而张格尔叛乱的失败,并未使得浩罕统治集团和分裂势力彻底死心。道光十年(1830年),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在受到分裂势力支持,在浩罕集团的扶植下继续在南疆制造骚乱。领队大臣额尔古伦率领锡伯、索伦及其他营的换防官兵前去支援镇压。与在伊犁、乌鲁木齐等地的锡伯、索伦等营的数千名援兵主动配合,平定了玉素甫叛乱,给英帝国殖民侵略者重击,挫伤了其利用浩罕国在新疆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阴谋。在此次平定中,锡伯等营为维护祖国统一、保卫祖国边疆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也印证了维护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心愿。

(三) 抵御沙俄侵略,维护祖国统一

1世纪初,沙俄就对新疆版图有所觊觎,之后其侵扰活动日益频繁。到同治三年(1864年),沙俄已经把我国的巴尔喀什湖附近的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强行划入沙俄版图。同治五年(1866年),沙俄认为新疆局势混乱,便想趁虚而入,试图出兵伊犁干涉清朝内部统治。同治七年(1868年)后,沙俄不断加强对伊犁地区的侵扰,伊犁地区的情形十分严峻。同治八年(1869年),沙俄侵入我国库尔嘎什,同年阿古柏自南疆侵入北疆时,就已向原锡伯营驻守的春稽地区增派驻兵,为进犯伊犁做准备。同治九年(1870年)九月入侵天山时,遭到了当地锡伯、索伦官兵的英勇反抗。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大举进攻伊犁,并用大炮轰城,当时驻守的各族军民誓死抵抗但仍节节败退,最终寡不敌众,伊犁失陷。自此,整个新疆陷入了灾难之中,南疆被阿古柏侵占,北疆有沙俄侵占,新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奴役与剥削之下。沙俄侵占伊犁期间在锡伯等营勒索钱粮,拷打旗人,极力压榨底层群众。当时的锡伯族及各营民众均处于沙俄的逼迫和凌辱之下,在经济政治上被严重剥削。俄人不断向索伦、锡伯、蒙古、汉人等民众勒索银两,民众生活极为困苦,即使把各营的牲畜、粮食全部变卖也不能够满足。将军荣全得知此事后尽力资助民众,俄人竟百般阻挠。史书中载:“荣全接济锡伯银粮,俄官来咨不令管理,殊属狡横;荣全咨覆,谓锡伯系中国所辖之人,应由中国接济,俄国无庸管理,义正言辞,所言所办甚是”。将军荣全义正辞严地回复俄人锡伯民众乃中国所辖之人,坚决维护民众利益。

俄人侵占伊犁后,不停煽惑人心,希望有人归顺于俄,为俄办事。而满洲各营官员共议得“均已同心能死,不降外夷。”皇上之后下旨:“该处官民感戴国恩,不为俄人

所煽惑，其志可嘉，所有各营官员，著仍以原职分管各众，并准以喀尔莽阿暂署锡伯营总领队图记，各营事务，即责令一体照料”。锡伯营领队、总管喀尔莽阿不服外强，不为俄人所煽动，俄国屡次交代的事情，拒不遵办，积极抵抗，且常将伊犁情形报于将军荣全，引俄人不满，令立刻驱逐出境。同治十三年二月庚辰（初七日）（1874年），署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奏：“窃奴才于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六日（1873年），署据锡伯营领队、总管喀尔莽阿专差领催苏春泰等来塔具禀，……前年本固必纳图尔带兵进伊犁后，看总管你是中国伊犁大员，足以将你们人仍令你管，所办各事，你应遵照我们俄国办理。今屡据我们立什富斯奇报称，你于我们俄国屡次交办之事，由不遵办，且将伊犁情形时常报你们将军知道，以至伊犁各营人存二心，由此看来，坏伊犁之事是你。今我们已将锡伯营事务另派防御阿木昌阿办理，你或由恰克图进京，或赴塔尔巴哈台去见你们将军，限半月内变卖家产，携亲带族，迅速出境，若不速去，我们即派兵将你拿送西悉毕尔地方，永不会你回国等语……”。喀尔莽阿力与俄人抗辩，大义凛然。但无奈沙俄“催逼不容”，才携带妻家子孙离去，在去往塔城行营之时，匍匐痛哭，令人悲愤。喀尔莽阿离开之前仍交代各旗佐领，要按照清朝章程办事，不得损害祖国利益。^[6]喀尔莽阿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新疆各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斗志，成为各族人民的榜样，为捍卫祖国完整和边疆安全做出了贡献。

二、锡伯族西迁在经济方面的贡献

锡伯族被编入满洲八旗前，因受到长期的居住环境的影响，生产方式一直以渔猎游牧为主，农耕为辅。分驻东北齐齐哈尔、墨尔根等地后，在同各民族的经济交往中，生产方式渐渐转向农耕化，以农耕为主，并且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有了新的发展。西北边疆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开发，离不开锡伯族军民对伊犁地区与该地其他民族农业发展的努力。

锡伯族军民在伊犁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贡献卓著。

其一，锡伯族军民修筑了多条水渠，像察布查尔大渠、黄渠等。凭借这些开辟的水渠，他们开垦出大量荒地，让原本荒凉的伊犁地区发展成农业发达的地方。

锡伯族官兵对伊犁河南原有的绰豁尔大渠（也叫锡伯营渠或锡伯旧渠）进行了疏通。这条大渠疏通后，灌溉的土地面积达到了10000多亩，沿绰豁尔大渠的农业得以开发^[7]。

随着时间的推移，锡伯族人口逐渐增多，现有的粮食产量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因此，必须扩大耕地面积。锡伯族军民便引伊犁河水垦荒种田，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条新渠的开凿。这条新渠的建成，不仅解决了锡伯族的耕地问题，也为当地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8]。

除了对本营所居地区展开开发工作之外，锡伯营的官兵们还接受命令前往其他地区开展兴修水利、开垦屯田的工作，目的在于积攒军粮。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的时候，伊犁将军松筠开始在黄草湖一带修筑堡墙，并且安排八旗壮丁在此处进行屯田。随着时间的推移，惠远城八旗人口持续繁衍增多，对耕地的需求也在一天天增加。他们挖掘阿齐乌苏布哈水渠，通过引伊犁河水来开垦种田，成功解决了伊犁惠宁、惠远两城满营军民的粮食供应问题。阿齐乌苏布哈水渠的成功开凿，对伊犁河以北的农业生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锡伯营军民的生产自救活动，对当时伊犁地区满营的生计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在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例如满营就仿照锡伯营的模式，在黄草湖开垦屯田，使得满营中的闲散兵丁能够实现自力更生，这一举措极大地改善了满营的生计状况。到了道光年间，锡伯营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与支援作用。锡伯营派遣色明阿、泰文太前去指导满营重修阿齐乌苏渠，并且抽调了部分锡伯兵投入到修渠工作当中，这些锡伯兵的加入大大加速了修渠的进度，从而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创造了更好的灌溉条件。

光绪初年，锡伯营官兵积极参与边疆建设，他们在博尔塔拉、精河、库尔喀拉乌苏等地开荒造田。在当时，左宗棠军队面临粮草供应的需求，锡伯营官兵所开垦出的田地生产出的粮草，及时为左宗棠军队提供了有力的物资支持。到了光绪末年，色普西贤又率领锡伯兵丁前往特古斯塔柳地区进行屯田。而在博尔塔拉和塔尔巴哈台屯田的锡伯族军民一方面，在清军收复伊犁的过程中提供了支援，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上，都为清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他们给察哈尔营军民传授耕种技术，这一技术的传授，对于察哈尔营地区的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积极推动了这两个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锡伯营军民在伊犁屯垦所取得的成功，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正是有了锡伯营的成功经验，清政府对新疆的经营决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清政府进一步开发和治理新疆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锡伯族西迁在文化方面的贡献

在锡伯族西迁之后的两百多年间，察布查尔地区的民族居住格局历经了诸多的变迁，逐渐形成了各个民族交错杂居的局面。锡伯族、满族、汉族、撒拉族、维吾尔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回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等众多民族都汇聚于此地居住^[9]。

空间距离与地理位置的接近，使得各民族在情感上的距离也逐渐拉近。各个民族之间秉持着睦邻友好的态度，构建起团结友爱的民族关系。在生活方面，他们相互扶持、彼此帮助，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还是面临困难时的相互救助，都展现出了这种互帮互助的深厚情谊。在文化

领域,各民族之间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互鉴。他们分享各自独特的文化元素,如艺术形式、传统技艺、文学作品等,从而丰富了彼此的文化内涵。在习俗上,各民族也相互影响,一些习俗在相互交流中得到传播和融合,形成了新的文化特色。

锡伯族风俗习惯的交融与创新鲜明地体现了其文化所具有的融合性和历史性特征。一方面,锡伯族积极吸收兄弟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例如,在建筑风格上,可能会借鉴其他民族的布局设计或装饰元素;在服饰文化方面,融合其他民族的图案或制作工艺。^[10]另一方面,锡伯族的文化也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锡伯族文化根据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相应地发展变化。这种文化习俗的相互交融为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保障。各民族之间因为文化的交融而拥有了更多的共性特征,这些共性特征为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同时,也极大地充实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向前发展。

锡伯族在与当地其他各民族共同生活的时间里,逐渐形成共同的文化记忆。这一文化记忆的形成,不是对单一民族文化的传承,而是通过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细节,与其他民族携手共同创造出属于全体民族共有的民族文化。这种共同的文化,它突破了单一民族文化的边界,蕴含着广泛的文化共性。这种共性的存在意义非凡,它使得各个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中更加得心应手。各个民族之间基于这种共性,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彼此的文化内涵,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感。

在当今时代,锡伯族与当地的其他民族都很好地保留着各自的民族独特性。然而,他们也共同创造出了极具特色的区域文化,这一点在众多的生活习惯以及文化习俗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饮食文化方面,可能会有某些共通的特色美食或者烹饪方式;在节日习俗上,部分元素也可能相互借鉴或者共同庆祝。

锡伯族西迁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就像是一把钥匙,开启了祖国东西不同文化相互磨合的大门,在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民族和谐共处等多个方面都有所体现。锡伯族西迁之后,他们与当地民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积极地投入到共同铸就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事业当中。他们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锡伯族西迁的当代价值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英勇无畏且骁勇善战的锡伯族军民响应圣令,毅然踏上西迁伊犁之路。他们心怀国家大义,为了保卫祖国的边疆安全,决然地告别故乡的亲人,离开那片生养自己的土地。在西迁途中,他们遭遇重重艰难困苦,然而,锡伯族军民始终坚定不移地向着目的地前行。

这种行为充分彰显出锡伯族优良的民族品质,他们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质展露无遗,众多这样的品质与气质汇聚起来,便形成了坚韧执着的西迁精神。

锡伯族的西迁精神诞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锡伯族积极主动地去应对所面临的困境,凭借顽强的毅力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种西迁精神是锡伯族优秀民族品质的绝佳体现,它生动地诠释了这个民族顽强不屈的精神和不畏艰险的态度。西迁精神进一步充实了锡伯族民族精神的内涵,使得锡伯族的精神文化更加丰富多样,也为锡伯族的后代提供了可供学习和借鉴的榜样,如同源泉一般,为后代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与精神支撑。

锡伯族的西迁精神具有教育、鼓舞和振奋人心的重要作用,充分展现出其作为精神财富的价值与意义。同时,西迁精神的基本内涵隶属于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也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包含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内涵的中华民族精神。锡伯族的西迁精神是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体现,它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特点、民族精神气质以及民族意志品质,已然成为中华民族不断进步与发展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爱国主义精神堪称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各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锡伯族在万里戍边的历程中,以实际行动将爱国主义精神融入自身的民族血脉,在保家卫国方面作出了卓越表率,深刻体现出其坚定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锡伯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具体表现在,当面临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无法两全的抉择时,毅然决然地选择爱国护国,优先维护国家和集体的整体利益。^[11]在十八世纪中叶,西北边塞地区动荡不安,叛乱频繁。准噶尔封建势力裹挟众多平民再次发动叛乱,紧接着,大小和卓乘虚而入,致使边疆的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困苦不堪。到了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末,虽然叛乱刚刚平定,但边疆的防务依旧空虚薄弱,急需英勇善战的士兵前去驻守边疆、保卫祖国。锡伯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勇敢地挺身而出,踏上万里戍边卫国之路。他们告别故土与家乡的亲人,在漫长的迁徙途中历经无数艰难险阻,饱尝千辛万苦,但始终没有放弃,最终承担起时代赋予他们的民族使命,展现出着眼大局、志向高远的高尚品格,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彰显得淋漓尽致。

在清代,锡伯族奉命西迁戍边,以此巩固边防、维护祖国统一。在政治方面,锡伯族官兵承担着众多重要职责。他们驻守卡伦、换防台站,在平定叛乱以及反抗外来侵略等事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无论是面临内部的忧患还是外部的侵扰,锡伯族军民始终奋力抵抗,毫不动摇地坚守信念,坚决维护祖国的利益。锡伯族的西迁之举对稳固边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在经济领域,锡伯族军民积极投身农业生产。他们开垦大量荒田,大力发展旗屯,赡养旗人,有力地带动了边疆屯田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他们积极兴修水利设施,开凿众多大渠。这些水利工程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水患问题,还能够引水灌溉,为边疆的开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锡伯族军民不畏艰难险阻,在这片原本荒芜的土地上扎根生存,忠实地担当起守卫边疆的神圣职责。

在文化层面,八旗内部大力兴办义学。八旗子弟们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熟练掌握多种语言,并且擅长骑射。锡伯族民众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语言、戏曲、文学创作等方面各自展现出独特的优势,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力量。锡伯族的骑射技艺相当精湛,当时旗内依据骑射技艺来选拔人才,骑射技艺出色者才有机会披甲当差,它成为评价官兵能力的重要考核标准。在锡伯族内部,骑射技艺一直备受重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这些方面的发展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锡伯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种种表现,无不体现出锡伯族无私奉献、自强不息、勇于进取、团结互助的爱国主义精神。

锡伯族西迁是彰显爱国主义的伟大壮举,这种集体主义的爱国观激励着锡伯族军民为国家奉献一切。^[12]这种大公无私的爱国传统深深铭刻在锡伯族的血脉之中,养成了他们不怕万难、不畏艰险的民族气节。锡伯族始终将维护祖国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锡伯族西迁到新疆至今,已经过去了20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锡伯族群众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爱国情怀,默默地在祖国边疆辛勤耕耘,为维护边疆的稳定和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3]同时,他们也在历史上树立起民族团结的旗帜和典范,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各族的儿女都为保家卫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锡伯族所展现出来的爱国奉献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他们与各民族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结语:

综上所述,清代锡伯族西迁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英雄气概的爱国主义史诗。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骁勇善战的一员,锡伯族在国家边防空虚、外敌觊觎的危难时刻,毅然舍弃故土、万里戍边。在两百余年的岁月里,他们通过驻守卡伦、平定叛乱、抵御外侮,构筑了西北边疆坚不可

摧的安全屏障;通过开凿渠道、垦荒造田,将荒芜的伊犁河谷建设成为富饶的塞外江南;通过与当地各民族的交融互鉴,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多民族区域文化。

锡伯族所展现出的“西迁精神”,核心是以爱国主义为灵魂的民族凝聚力。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当代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财富,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命运与共的生动写照。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挖掘和传承锡伯族西迁的历史价值,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 [2] 韩启昆.《锡伯族西迁戍边路线图》解[J].满族研究,1994(02).
- [3] 锡伯族简史编写组著.锡伯族简史[M].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 [4] 贺灵、佟克力、佟玉泉著.锡伯族百科全书[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 [5] 永莉娜.图伯特任职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时期满文档案译释[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6(04).
-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实录》,卷322,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 [7] 安阳.清代新疆锡伯族移民及其边疆开发研究[D].西北民族大学,2008.
- [8] 吴元丰、赵志强.清代锡伯族对祖国的贡献[J].满族研究,1989(02).
- [9] 肖学俊.“汗都春”与锡伯族的多重文化认同[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03).
- [10] 李云霞.锡伯族文化探微[D].中央民族大学,2010.
- [11] 徐鹏志、徐书典.锡伯族西迁是伟大爱国主义的壮举[J].黑龙江民族丛刊,1985(03).
- [12] 谢诗瑜.新疆锡伯族爱国主义精神当代价值研究[D].新疆大学,2019.
- [13] 张国欣.锡伯族万里戍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N].中国民族报,2020-11-24(005).

作者简介:付云逸(1999.05-),女,汉族,辽宁鞍山、硕士研究生在读、职称无、研究方向:民族学。